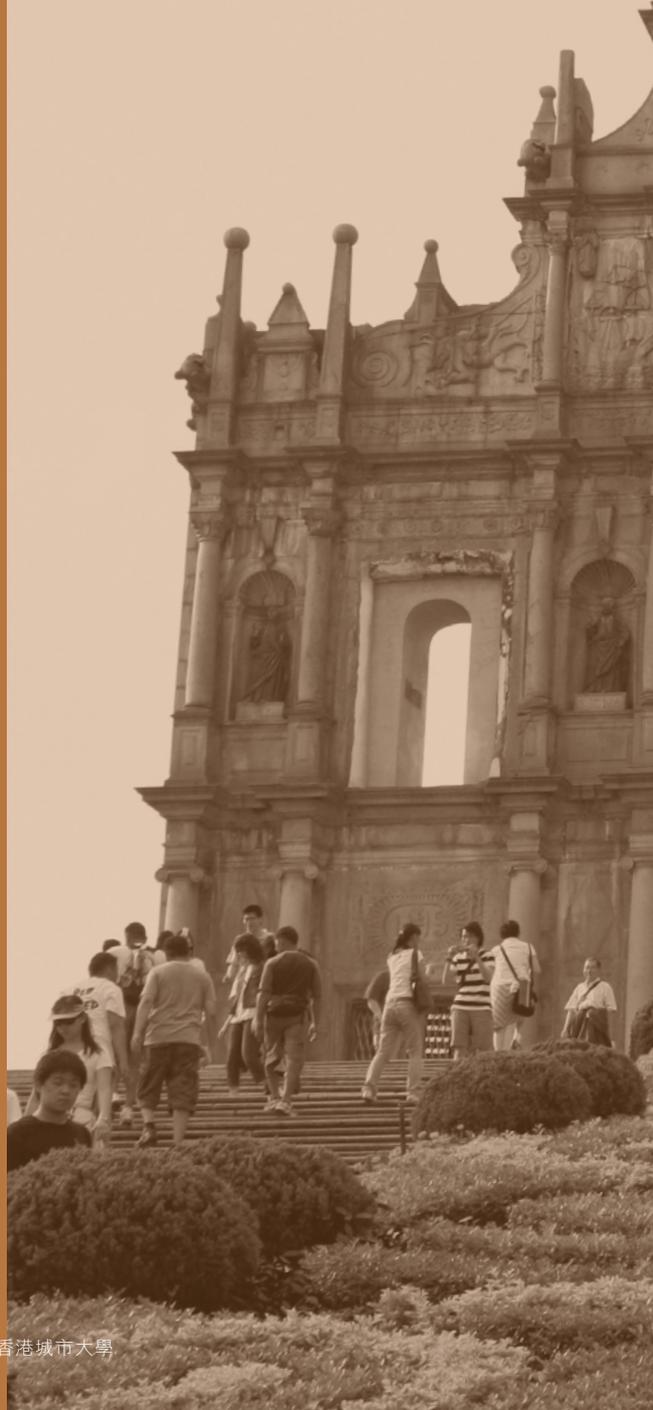


1

澳門風貌





澳門地理位置及氣候

澳門位於珠江口南部的西岸，面向中國的南海，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中一個特別行政區。澳門與東鄰的香港相距38海里（70公里），面積大約是香港的四十分之一左右。澳港二地日夜有航船往來，航程約1小時，形成一種雙子城的地理格局。

回溯明清時期，澳門的名稱包括蠔鏡澳、香山澳、澳山、馬交、濠鏡澳等。¹本來在明末的時候，澳門仍然是個小島，但由於西江的泥沙漸漸沖積，形成澳門連貫大陸之間的沙堤，其位置即今日關閘馬路。之後不斷填海，把原有狹長的沙堤加寬為今天西北的台山區及黑沙環區。澳門半島面積狹小，以丘陵地形為主，平地多是沿海填造而成，澳門半島最高的山為海拔91米的東望洋山。

澳門北面毗鄰廣東省珠海市，在拱北口岸相連，過往以1849年建成的關閘為界。回歸後因澳門與珠海來往更加頻繁，於是澳門政府在原有珠海口岸建立了新的大型客務大樓。昔日的舊關閘成為了今天澳門與珠海邊界前的一個古蹟。在人民幣尚未大幅升值時，每逢周末都是澳門人北上珠海消費的熱門時候。澳門在1950年代之前，主要的對外港口在內港，和中國內地的灣仔（並非香港的灣仔）僅一水之隔，坐船到當地只需10分鐘左右。橫琴島鄰近路環西邊，正是澳門政府未來向珠海政府租用40年的區域，澳門大學的未來校區就將在此興建。

葡萄牙人入居澳門後，外文歷史文獻曾記載的澳門譯名有包括Amaqua、Amachao、Machoam、Macao、Macau等，雖然譯名的由來眾說紛紜，但有不少人相信是媽閣廟古名的對應譯名。²

澳門每年1月至2月有冷空氣過境，所以是全年最冷的日子，7月至9月則是最熱的時節。因為澳門半島及離島海岸線多，加上亞熱帶海洋性氣候，所以3月至6月是最潮濕的日子，充沛的降雨量為澳門水塘帶來存水。5月至9月是潮濕多雨的颱風季節。⁴多霧的春天，令澳門對外交通受阻。有些時候，濃霧會令航班取消或延誤。



全球有六個Macao？

中國只有一個澳門，但從全球角度來看，最少有六個以Macao（或Macau）為名的地方，分別在葡國的Mação、古巴的Macao、法國的Macau、莫桑比克的Macau及巴西的Macau。³



▲ 澳門位於珠海口南部的西岸，面向中國南海。

筆者曾經在一次旅程中因濃霧而在船上經歷3小時之多，皆因澳門港務局要求一條航線上只許一隻船航行，於是要等經已出發的船到岸後，才可出發。筆者當時親歷其境，雖然大部分因此而失約的乘客十分鼓譟，但當親眼見到大橋在濃霧中竟然可以完全被遮蔽時，也明白澳門政府為安全起見而盡的一番苦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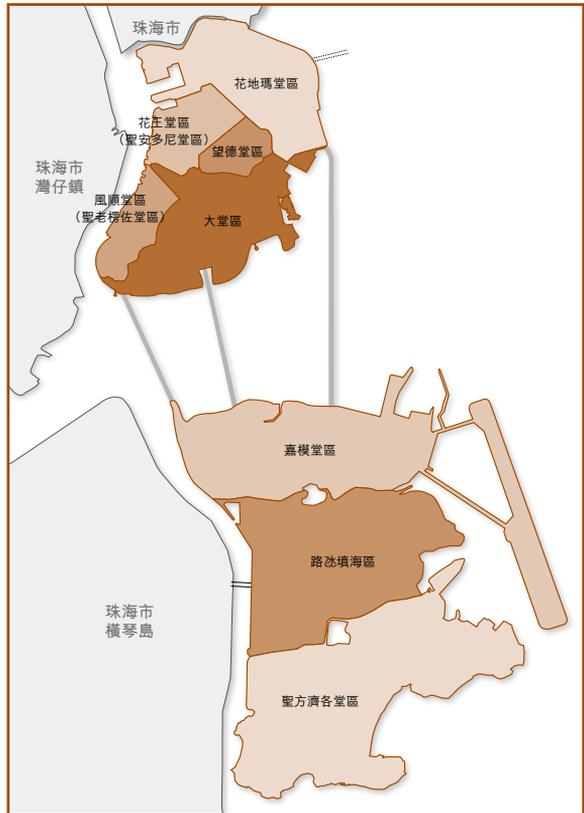
1980年代之後，在澳門北區及離島的農田也開發成房屋，然而澳門政府並沒有大力發展以高山為主的路環，保存了美麗的綠化帶，供人回味賭權開放前澳門舊有漁村風情。澳門填海的地方由於沿岸高度比較低，在颱風大雨時往往有海水倒灌的情況，有些外港地方更有鹹潮。

行政區域

由於自19世紀中香港開埠以來，澳門發展放緩，保存了不少當時已有的古蹟，例如大小廟宇、教堂及家族大屋，其建築年代及意義各有特色，吸引遊人觀光憑弔。行政事務直接由澳門政府管轄，民政事務則分別由管理澳門半島的澳門市政廳，以及管理離島的海島市政廳處理。各區名稱至今仍然沿襲本來天主教會堂區的名號。

除了填海的地區之外，澳門半島大三巴以南的舊城區，都是昔日在16世紀至19世紀葡萄牙殖民地政府統治時所建立的。對澳門舊城區街道有認識的人都會發現到，澳門有不少狹小的街巷，反映了當時人口仍然未有今天這樣密集，人們以步行為主，並沒有現代車水馬龍的都市規模。這種格局令今天舊城區的城市發展有很大的挑戰，因為這些狹窄街巷本來只適合兩三層高的樓房，而今天卻建有高樓大廈，如同石屎森林般的城市峽谷景觀。

澳門還有兩個分別在1860年代至1910年代逐步被葡國人佔領的土地，其中之一就是氹仔列島。而路環島一直都沒有太大規模的填海工程，發展也只集中在路環市中心、黑沙海灘、竹灣等沿海地區而已。



▲ 澳門的行政區劃單位沿襲天主教「堂區」名號，現有的七個堂區，有五個位於澳門半島，路氹填海區則沒有劃分堂區。



氹仔列島

氹仔列島原分為大氹、小氹及一粒米三部分，後因填海關係，三個島而合三為一，成為戰後氹仔島的初貌。

20世紀末，澳門半島與氹仔之間仍然是以三道橋樑連接。澳門博彩業開放後，原本用以建立工業村及公共房屋的路氹城，被重新規劃成旅遊博彩業的重鎮，路氹城兩側的地從此消失。直至2003年，把氹仔及路環的海域填成的路氹城（Cotai或Coloane-Taipa）的大型填海工程完工之後，才形成今天澳門特別行政區由澳門半島及路氹城並立的體系。⁵多間博彩企業在路氹城投資興建豪華酒店。另外，澳門特區政府為配合東亞運動會的項目，也在路氹城興建澳門東亞運動會體育館、澳門國際射擊中心等體育設施。

澳門人口的演變

澳門的人口數字從來都引人入勝，因為現在在如此小的地方竟有552,300人之多，可說是世界奇觀。最初在葡萄牙人來到澳門時，當然沒有正式的人口統計，但相信已有約800或900名葡萄牙已婚者往來澳門，但真正的居民只有500人。而在華民紀錄中，第一次有比較具體的人口數字，是1839年林則徐下令在澳門進行人口調查所得的，當時的數字是1,772戶華民，男女人口只有7,033人；而西方人共720戶，人口有5,612人。如此說來，澳門在19世紀中葉時，總人口只有12,645人。在歷史上多次中國南方的政治不穩定局面，難民遷入澳門，亦是過往澳門人口增加的主要原因。⁶

19世紀以前的澳門華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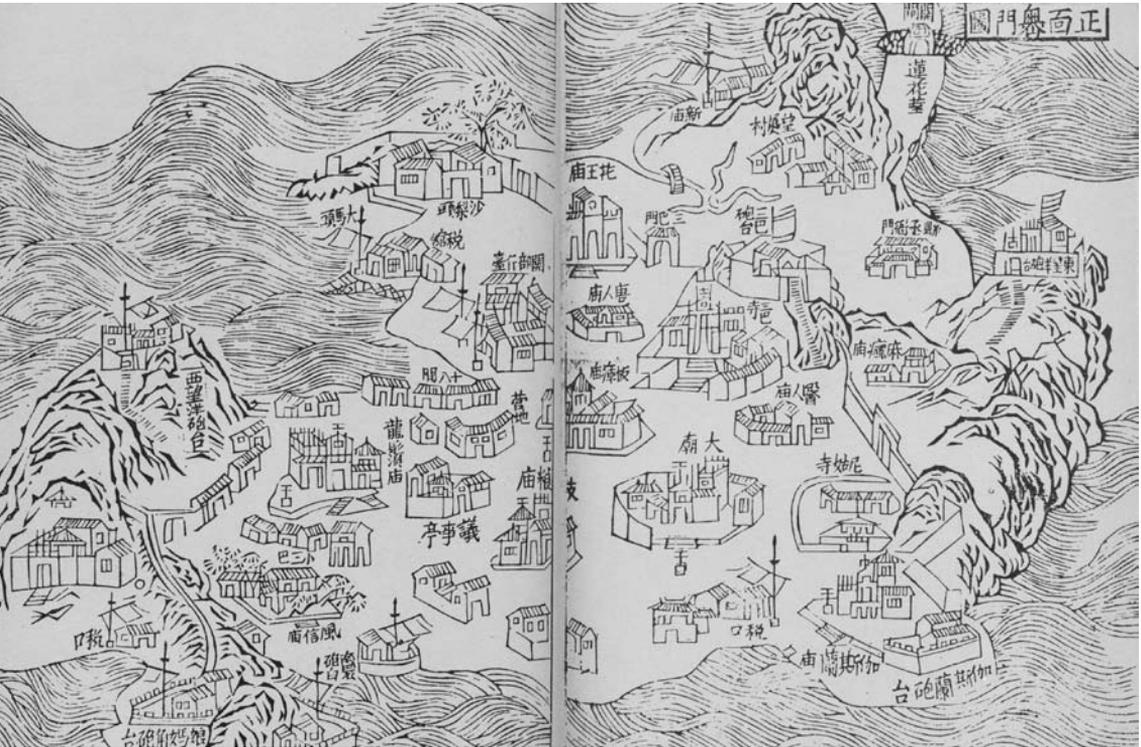
16世紀中葡萄牙人發現澳門前，該地屬於香山鎮的小漁村。學者劉月蓮及黃曉峰指出，從過往澳門的語言中，水上居民稱為「蜑家」（或俗寫成「蛋家」），其中有一些被稱為「蠔蜑」。他們以捕魚採蠔為生，與澳門其中一個古稱「蠔鏡澳」所反映的生活形態相近。

澳門流行的漢語方言雖以粵語為主，但閩語在福建社群中亦有較多人使用。福建人在澳門早期發展中擔當重要的角色，例如在16世紀之前，閩語即隨媽祖信仰在澳門南端傳播。學者劉月蓮及黃曉峰甚至推論葡萄牙人在澳門首次聽到的中文，可能就是福建話。陸上居民方面，現時望廈是澳門半島上的住宅區之一，「望廈」這村落在《澳門記略》及《香山縣誌》均有記



香山鎮

香山鎮在宋朝時是東莞縣屬地，其管轄範圍包括浪白滘及位於珠江口伶仃洋上的各個小島，這樣的地理造就了漁民活動。



▲ 望廈村早在《澳門記略》及《香山縣誌》中已有記載，村名「望廈」可能有福建居民盼望家鄉廈門之意。

載。村民大部分來自福建，以趙、何、沈、黃、許各姓氏為主，二次大戰後當地仍然有農田及水池，可見該地一直都適合耕作。其村名「望廈」可能是閩籍居民盼望家鄉廈門之意。而望廈的另一寫法是「旺廈」，除了期望廈門興旺之外，亦可能是因為各地方言不同而令書寫記錄有所不同。⁷

19世紀中期是澳門由葡萄牙的租借地轉變成為殖民地的關鍵時期，英國人在鴉片戰爭後建立香港，葡萄牙不得不追隨英國推行殖民擴張，否則英國人下一步很可能要求清政府把澳門割讓為英國殖民地。這種政治上的改變，也吸引了一些學者開始研究當中有關華人身份的討論。澳門史家吳志良博士便曾經提出著名的「另類蕃坊說」，把1849年前的澳門與廣州蕃坊相提並論。⁸

另一種說法是澳門社會是華洋共處而分治的觀點，例如西方學者將澳門這種特殊政治法律狀況歸納為「混合管治」(Mixed Jurisdiction)或「雙軌制」(Dualism)。澳門的葡萄牙商人主導的議事會，在中國明清兩朝政府默許下，行使葡萄牙人的自治權力，處理司法、宗教、貿易以及市政建設等問題，因此有學者認為這是遠東最早的民主經驗之一。這些不同的解釋，反映了「主權」觀念在19世紀的轉變，以及中西方對海外領地在當時有不同的看法。

在數個世紀以來，華人的歷史當然不會一成不變，而是多重變化的。可惜的是漁民的文字紀錄一般比較少，而古代農村的消失也令本來保存的文獻及口述回憶散佚。現存沙梨頭的土地廟，相傳有兩個世紀的歷史。根據劉羨冰校長的研究，該廟曾建有「更館社學」為漁民子弟提供基本的傳統儒家經典的教育。⁹

幸好望廈村趙氏在澳門半島上仍然存在，面對城市化及現代化的挑戰，史學家唯有根據《趙書澤堂家譜》，當中記載清中葉時期，澳門已經出現了舉人：

趙元輅，字任臣，號九衢，例授文林郎，以府案首入泮，補廩繕生，乾隆丁酉科中式，廣東鄉試第十八名舉人。著有觀我集，以會試卒於京師。……趙允菁，字孔堅，號筠如，元輅長子，例授文林郎，嘉慶辛酉科中式，廣東鄉試第四名舉人。道光丙戌科會試後大挑二等，授南雄始興以教諭銜管訓導事，越二載，李鴻賓制憲謂其足為文士楷模，調委越華監院，邑人士聯名請仍留學任，以培士氣而功人材。癸巳年陞授平州學正，改就京職，籤授翰林院典簿，著有書澤堂文稿行世，卒於道光甲午年。¹⁰

這次望廈村趙氏父子同於嘉慶年間相繼中舉，引為一時佳話。於是在望廈村的趙氏祠堂內，曾懸有「父子登科」牌匾供人憑弔。可見澳門曾經出現本土的知識分子，但似乎只是曇花一現而已。¹¹

根據學者楊仁飛的研究，比較有規模的華人團體可上追到華人行會興起的時期。這些華人與本來居住在望廈村的農民或地主不同，因為他們都是以體力勞動為主的技術工人。這與當時澳門對外貿易到達頂峰，大量華人口

移入澳門謀生不無關係。例如不遲於1840年代已經就成立的上架行會館，便是華人的行業組織，包括當時木匠、搭棚、打石三個行業的工人。¹²

19世紀前的澳門葡萄牙人及英國人

葡萄牙人初到東方之時，尚未有兼通中葡雙語的土生葡人作為他們的中間人。於是中葡雙方通商來往唯有依靠第三者的協助下進行，他們就是被稱為「舌人」、「通事」或「通譯」的「雙語精英」的中間人。早在1517年，首名來華的葡國大使托梅·佩萊斯（Tomé Pires），便與五名翻譯人員同行。博克舍（Charles R. Boxer）編著的《16世紀中國南部紀行》所載：

葡萄牙人和中國本土最早的交往是由一些冒險商人實現的，他們從馬六甲乘坐當地的船隻駛抵中國南方的海洋，而且他們發現把香料運往中國，和運往葡萄牙一樣可獲大利。¹³

從以上的記載可見，這些為葡國人服務的舌人，極可能是滿刺加（即今日馬六甲）人，因為他們兼通華語及葡語。依靠舌人只是一個過渡階段，在外交活動中這些雙語人才非常重要的。

除了商人及使節以外，相傳在葡萄牙大航海時期，葡國的著名詩人賈梅士（Luís Vaz de Camões）來過澳門。他在約1556年至1558年間完成了他的傳世名詩〈盧濟塔尼亞人之歌〉（Os Lusíadas）的部分章節。這首頌揚葡萄牙建國的長篇史詩，是公認最優秀的葡文詩歌，因此亦稱為〈葡國魂〉。著名澳門史家文德泉神父便認為他是在澳門聖安多尼堂附近的石洞中寫下的。這個石洞相傳位於今日澳門的白鴿巢公園，令澳門增添了葡萄牙文化的色彩。

葡萄牙人在澳門的初期是根據近世時期（Early Modern）的海外城市政模式建立起來，而澳門議事會也是根據「地中海的城市共和國模式組織的」。葡萄牙人發展澳門對外貿易，經濟繁盛令葡國人人人口增加，為進行葡國人的自治提供基礎，但他們並不受到葡屬印度總督（Vice-Rei）的完全控制。早在開埠之初的1560年，居澳的葡人已選出駐地兵頭（Capitão de Terra）、法



賈梅士

賈梅士曾在非洲當兵，不幸失去右眼，也曾在里斯本因持劍傷人入獄。他在1580年6月10日於里斯本逝世，這天成為政府法定的「詩人節」，亦是世界葡僑日。

官和四位具有威望的商人來處理他們社區的內部事務。

1569年，賈耐勞（D. Belchior Carneiro）主教創設仁慈堂（Santa Casa da Misericórdia）的澳門分會來提供福利。到了1580年里斯本才派出首位大法官（Ouvidor）主持刑案，在中國文獻《澳門記略》中稱之為判事官。三年之後的1583年，薩（D. Leonardo de Sé）主教倡議和主持了澳門首次葡人選舉並成立議事會（Senado）。¹⁴

議事會的制度一直行使至1999年12月19日晚上，因此對澳門的影響極大。雖然議事會在制度及權力上屢有更改，但其建立之初的歷史仍然是很值得注意的。到了17世紀初，荷蘭人曾三次進攻澳門。雖然三次入侵都不果，但澳門議事會明白要加強澳門防衛，必須要求葡萄牙的印度總督派遣軍人長駐方可保衛澳門。議事會在1615年增設戰督（Governador de Guerra）一職，到了1623年由印度總督委派馬士加路也（D. Francisco Mascarenha）出任，才正名為兵頭（Capitão-Geral）或總督（Governador）。他們負責防衛，不可過問行政，因此議事會一直佔有主導地位。

澳門葡人除了有建立政治組織外，還有建立澳門仁慈堂（Santa Casa da Misericórdia de Macau）等社會團體。他們發展社會福利工作，開辦醫院、育



▲ 白鴿巢公園也稱賈梅士公園，內有一塊刻有童子軍對賈梅士的讚頌文，可見當時澳門人對他的推崇。



▲ 仁慈堂位於議事亭前地，是發展澳門社會福利工作的慈善團體。

嬰堂、痲瘋院、老人院、孤兒院等。今天在議事亭前地的仁慈堂古蹟是19世紀多次重修之後的成果。在華文記載之中也有對仁慈堂描述，例如《澳門記略》中便以支糧廟來稱呼之，意味該堂是支付薪金的地方，但這種記載似乎忽略了收容棄嬰及資助貧病者其他重要方面。

值得注意的是18世紀末英國人已經來到遠東，並在鴉片戰爭前在澳門建立貿易據點。在尚未發明照相機的時代，來自歐洲與本地畫家的畫作，除有藝術價值外更兼具歷史紀錄的功能。華南的草木鳥獸，成為昔日畫作的熱門題材。當中最著名而且受日後澳門、香港、英國、美國的博物館及收藏家歡迎的，首推來自英國的澳門畫家錢納利（George Chinnery）。

錢納利

錢納利是19世紀英國來華的畫家，於1774年生在英國倫敦。性格不羈的錢納利在結婚之後，便旅居愛爾蘭、印度、廣州、香港、澳門等地。他於1825年來到澳門，生活了27年之久，直至1852年5月在鵝眉街的寓所逝世。錢納利是一位多產的職業畫家，但畫藝卻不穩定。他偶有佳作，但同時也有不少構圖重複及人物不合比例的作品。不過他的寫生，很多以澳門風景或人物為題材，反映澳門的風土人情。無論如何，他在藝術史上推有一定的地位，因為他影響了一些同時代的歐美及中國畫家。¹⁵ 錢納利死後葬於白鴿巢公園側之基督教墳場內，澳門政府也列千年利街（Rua de George Chinnery）來紀念這位非凡的藝術家。

19世紀中葉後華人社會興起

除了有社會慈善團體之外，也有帶政治色彩的社會群體。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澳葡兵頭亞馬喇下令從城牆之水坑尾門，開闢道路往龍田村背後，並直達關閘；途經的田園及華人墳墓均被掘及破壞，葡人還推進到望廈村，迫令居民向澳葡政府交稅，於是令這些長期向清政府納稅的中國人民反抗。一些村民在望廈的觀音古廟成立帶有強烈地緣色彩的「望廈鄉民知守義團」，對抗澳葡侵略，保家衛國。有關這個組織所剩下來的資料不多，很可能是一個名義上的抗葡組織，最後在1908年後正式解散。¹⁶

澳門在19世紀出現的行會，反映出澳門工人數目不斷壯大，同時反映工人需要團結互助的心態。不過除行會之外，更為重要的社會團體是不分出身、職業及方言群體背景的華人慈善福利團體。鏡湖醫院慈善會和同善堂都



▲ 19世紀中葉，望廈村的一些村民在觀音古廟成立帶有強烈地緣色彩的「望廈鄉民知守義團」，對抗澳葡侵略。

Ⓛ 澳門華人社團所面對的問題

對澳門華人社團素有研究的學者楊仁飛曾經分析，澳門華人社團要面對如澳門新成立的學術社團規模較小、會員及活動數目都不多、組織鬆散等問題。這可能是因為一人參加數個團體的情況所至，因此有一些團體缺乏群眾基礎。此外，部分團體的親中色彩雖然強烈，但真正的政治意識較低，也缺乏具社會聲望的領袖人物，因此號召力不大。最後，有50年歷史或以上的傳統社團，多數出現青黃不接現象，所以如何吸引青年人加入是一項重要的考慮。¹⁷

是這時期成立的重要代表，而且一直運作至今。¹⁸ 這些華人民間團體一方面為當時大部分從外地湧入的華人提供社會保障，同時亦令一部分殷實商人可藉此提高社會地位，形成一個新的華人社會階級。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於1871年成立，由沈旺、曹有、德豐、王六（又名王祿）等紳商發起，得到不少居澳華人歡迎，當年就能籌集經費近7萬元，由此可見此舉深得民心。

33條《華人風俗習慣法典》頒行之後，澳葡才正式對華人身份作出界定。不過雖然中葡雙方共處了兩個多世紀，但葡國政府在60多年的正式殖民統治後，才有這樣明確的界定，反映了葡國人對華人地位及管理向來是比較少的。

1909年6月17日，葡萄牙海軍暨海外事務部，頒佈以中國法律規範為藍本的法典，主要是對澳門華人的婚姻和繼承問題作出界定。究其原因是當時負責處理華人訴訟糾紛的華務檢察官署檢察長，認為處理華人的社會糾紛時，難以依據葡國法律來辦理，很多時最終都是由調解人和檢察長自行仲裁。由於中葡兩者間的社會風俗大有不同，因而迫使葡萄牙殖民地政府界定華人風俗。但這法令的推行並不是為了處理重大的政治身份問題，而只是在華人社會生活的層面上，如丈夫休妻的七出之條等，把原有中國人的生活習慣，加以法律規範。

抗戰前後至50、60年代的澳門華人組織

20世紀是澳門華人社會組織更為活躍的時候。例如在抗日戰爭爆發之前，澳門已經出現氏族會的組織，成為澳門民眾聯繫鄉情的組織，例如譚怡

堂（即澳門譚氏宗親會）、1933年成立的何族崇義堂，及1936年11月成立的梁族宗親會（即梁族聯誼會）等，可見澳門社會人口結構的組織化傾向。

1937年日本侵華，國難當前，一些愛國分子在澳門成立抗日組織與團體，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有澳門工商界和紳士名人成立的「澳門各界救災會」，以及國民黨澳門支部成立的「澳門各界抗敵後援會」。這些團體在艱難時期分擔政府的一些職能，尤其在非政治成分的施粥、施衣及救濟難民的工作上成效特別顯著。¹⁹

抗戰成功後，澳門在政局動盪不安的50、60年代中，開始成為難民逃難的目的地之一。戰後大量難民返回廣東故鄉，原有的救災會也失去其社會功能。澳門有如香港一樣，是新中國成立後國共兩黨角力的地方之一。從1945年至1965年短短20年間，親台社團增至119個，當中有社會性質、宗教團體、商業團體、聯業社團、文教組織，以及康樂性質的社團等等。有些社團是受國民黨直接控制，有的只是政治觀點上傾向國民黨。

同時間，有許多對新中國滿懷希望的澳門居民擁護中國共產黨，例如1950年前後成立的澳門工人聯合總會、澳門中華學生聯合會、澳門婦女聯合會、澳門街坊聯合總會等，都是明顯支持中共思想的。1966年「一二·三事件」（詳見第二章）後，親台組織被勒令停止在澳門活動，形成澳門華人社團基本上都是親向新中國的情況。澳門社團有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宗教、社會、娛樂等不同性質的團體，據統計澳門有大小社團逾460個，成為澳門社會的特色之一。

土生葡人的界定問題

澳門的土生葡人一般擁有以下的一些身份特色：在政治上擁有葡國國籍，並且能說流利的葡萄牙文。血統方面，他們不少是長期甚至數代在澳門生活的葡人及其他葡萄牙語國家地區人士，包括葡萄牙、帝汶、巴西、果亞、莫桑比克、安哥拉等地居民，以及他們在澳門出生的後裔。由於葡萄牙人在海外散局的歷史已有五個世紀之久，因此不少都有亞洲血統，形成了歐亞兩地文化融合的混血兒群體。

土生葡人

葡文中，土生葡人Os Macanese一詞是「澳門人」的直譯。土生葡人的來源最早是葡國人於居於東方時與中國、馬來西亞、日本、印度等地方婦人所產生的混血兒，所以他們早期被稱為東方的葡萄牙人。他們一般在面容上帶有西方人或東南亞人的樣貌特徵。



過往他們大都是天主教徒，由於近數十年現代化及電子化生活對生活的影響，不少宗教生活的方式也面對新的轉變，年青一代的土生葡人比上一代較少參與天主教教會的活動。²⁰ 不過每逢星期日也有不少人前往教堂參與彌撒，他們有不少是年長的土生葡人及華人天主教徒，他們帶着年輕的家庭成員一起前往參與宗教活動，也有不少來自香港的天主教徒前來參與宗教巡遊，當然也有喜歡攝影的遊客。澳門其中一個最大的教徒團體，很可能是在澳門工作的菲律賓人。

澳門見證四百多年的華洋雜處，葡國人與亞洲各種族相處產生特殊的混血兒群體，他們就是澳門土生葡人，俗稱「土生」。他們的父系通常是葡國血統的，葡萄牙文中稱他們為「大地之子」(Filhos da terra)，更地道的說法是「土生仔」。他們有特殊的血緣，也創造了他們獨特的文化。²¹

80年代前，土生葡人聚居地一般比較集中，而且會住在天主教教堂附近。過往在青洲與台山之間、玫瑰堂、大堂以及聖安多明堂附近的長樓街、高園街及新勝街一帶、望德堂前荷蘭園附近、聖老楞佐堂、三巴仔修院、澳督府附近都有土生葡人和葡萄牙人聚居。而西望洋主教山附近的聖珊澤一直以來都是富有的土生葡人及葡人官員居住的地方，當然該地亦是華人富豪的首選之一。有一些地方是因公務而聚居的，例如俾利喇街和望廈區的美副將馬路，因附近是軍人駐紮的地方，到了現在還有一部分房屋是由他們所居住。近年來澳門經濟急速發展，已不能如以前般明顯區分，他們的居住地方已經和大部分的華人混雜在一起。

土生葡人的政治角色在回歸前後也有明顯的不同。過往來自葡萄牙的殖民地官只依賴土生葡人作中間橋樑，擔任有效管治的協助者，把葡萄牙的政治實施到華人身上。土生葡人有不少在澳門的政府機關中任職，直到1984年第124屆澳門總督高斯達上校改革公共行政組織，才有大量華人進入公職隊伍。80年代前，澳門立法會議席多為土生葡人，形成立法會與澳門總督之間的角力，最終在1984年以解散立法會告終。其後，華人政治意識提高，土生葡人的政治力量才漸漸消退。

土生葡人如果有宗教信仰的話，大多數都信奉天主教。根據《澳門基本法》第3章「居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第42條規定：「在澳門的葡萄牙後裔

居民的利益依法受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保護，他們的習俗、文化傳統應受尊重。」土生葡人的宗教活動有的因主權回歸而化簡，他們中有的有經濟影響力的家族企業成員，如殷理基洋行及羅德禮洋行等，而且也有不少任職專業行業，如律師、醫生、工程師等。

國籍方面，土生葡人多數是葡萄牙護照持有人，但《中葡聯合聲明》的中方備忘錄規定「澳門居民在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規定者，不論是否持葡萄牙旅行證件或身份證，均具中國公民資格」，因此出現同時擁有葡籍及中國籍的情況。由於1999年12月19日或以前在澳門出生的澳門人都可以得到葡萄牙護照的申請資格，有部分澳門人到歐盟國家或英國留學，享受與當地學生的同等待遇。

澳門土生葡人的政治身份面對最大的挑戰可謂1966年至1967年的「一二·三事件」，另外1987年4月13日《中葡聯合聲明》的簽署也令他們在澳門地位受到影響。土生葡人在澳門公共行政機關中擔當要職，主要是由於他們能夠與葡萄牙殖民政府的官員溝通。他們有的能操流利的廣東方言，也吸收了一些中國文化，另有一些則已經被本土華人同化。土生葡人在澳門歷史上佔有重要的位置，比較著名的包括認識孫中山先生的土生葡人連斯科·飛南第（Francisco H. Fernandes）、在澳督亞馬喇將軍（João Maria Ferreira do Amaral）被刺後，繼續擴張澳門殖民地的美士基打（Nicolau Vincente de Mesquita）上校及前澳門立法會主席宋玉生博士（Dr. Carlos d'Assumpção）等等。²² 土生葡人在香港的政府亦十分活躍，例如香港前行政局議員、前立法局首席非官守議員及廣播事務管理局前主席羅保爵士（Sir Rogerio Hyndman Lobo）等。

葡粵語之外的澳門語

澳門人口以來自廣東的華人為主，加上澳門人不少也是看香港的電視廣播，因此日常生活主要以粵語為主。目前，40%以上的澳門身份證持有人不是在澳門出生，他們有的是內地的移民，所以說的粵語都帶有中山口音或其他廣東省地方語言的語音特色。除廣東省以外，也有不少澳門人是來自福建的新移民，但在公開的場合比較少聽到以閩語來作演講或廣播。



葡萄牙護照申請資格

在1999年12月20日前在澳門出生的人士，亦可以成為葡萄牙護照持有人。



香港演藝界的土生葡人

政界以外，土生葡人在香港演藝界亦十分活躍，如賈思樂（Louie Castro）、人稱「肥媽」的歌手瑪俐亞（Maria Cordero）、李嘉欣（Michele Monique Reis）、梁洛施（Luisa Isabella Nolasco da Silva）等。

相對於香港而言，澳門的普通話普及程度較高，除了不少新移民都是在內地完成基礎教育才來到澳門以外，也有不少土生土長的華人會選擇到內地升學，如暨南大學、中山大學、北京大專院校等，他們大多以普通話來上課。澳門學生另一升學的熱門地點是台灣，因為台灣有港澳同胞的名額，所以因利成便。時至今日，澳門仍然有不少在台灣各所大學、暨南大學、中山大學畢業的學生，在政府及工商界擔當重任。

葡語是澳門葡國人社群的主要語言，葡國人的構成也可說是來自五湖四海。這些葡國人社群的人，有土生土長的土生葡人，也有的是從葡萄牙而來的。年長一輩的土生葡人會說一種土生葡語（Patuá或Macanese），這是一種以葡萄牙語為基礎，混合馬來西亞文、粵語、日語等詞彙而成的混合語言（Creole）。清代乾隆時期寫成的《澳門記略》的〈澳蕃篇〉也是以土生葡語來記錄一些常用字彙的。

土生葡人的數目在19世紀中期至20世紀初期有過明顯的變化。自香港及上海開埠以後，澳門的商港地位便被前二者取代，因而有不少土生葡人出外工作。19世紀末的時候，更出現過在上海的葡國裔人士較在澳門的葡國裔人還要多的情況。加上20世紀下半葉先後出現衝擊澳葡統治的「一二·三事件」及澳門回歸等政治因素，不少仍然在澳門的土生葡人選擇移民到巴西、葡萄牙、澳洲、加拿大、美國、英國等地，在街上見到的土生葡人的數目也比回歸前少。

在澳門見到的專名語言不少都是來自葡文，澳門華人亦普遍不會葡語，常常出現的情況就是葡語地名和中文地名南轅北轍的現象。澳門的官方語在回歸前是葡文，主權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後，中文享有同等的法律地位。英語是國際語言，在不少地方也普遍使用，尤其在回歸後新建的店舖，往往會使用英文作為他們的外文名。

葡萄牙語在華人社群之中並未能完全普及的原因很多，最主要是因為葡文不是每一間小學及中學的必修課程，加上澳門有四成左右的華人並非在澳門出生，接受西方語言教育的機會比較低，故此大部分華人都不能以葡文溝通。葡國文化在澳門華人之間並沒有完全植根，因此以認識葡文來了解拉丁文化、文學及歷史的人數不多。回歸前年長一代的澳門人認為讀葡文只是為



航海大國葡萄牙

作為一個曾經擁有非洲、巴西、東南亞不少殖民地的航海大國，這些地區在獨立後仍然形成了為數眾多的葡語系國家。這些擁有共同或類近語言的國家，尤其以巴西、馬六甲、帝汶及部分非洲國家與澳門最有關聯。

考入政府而鋪路，而葡萄牙的經濟實力遠不及美英等國，因此很少大力鼓勵年輕人學習葡文。澳門沒有學外語的風氣，比較受歡迎的外語是日語。

老一輩土生葡人的葡語及英語的聽講寫讀都有很高的水平，並且兼有粵語的聽講能力。年青一代的土生葡人則不少是葡、英、粵及普通話兼擅的。土生葡人的中文名也有不少特色。例如有些人名是用他們姓氏葡萄牙的發音來作為他們的全名的，例如高美士（Luís Gonzaga Gomes）。也有一些是以姓氏的第一個音節為姓，以名字的中文翻譯為名的，例如澳門著名土生葡人小說家飛歷奇（Henrique de Senna Fernandes），及其子大律師和劇作家飛文基（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現在澳門本地出生的年青人多數都能說粵語、普通話及英語。年長的新移民，說粵語時往往帶有原居地口音，以中山石岐及順德等地為多。回歸後普通話的地位日漸重要，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只懂普通話問題也不大，因為粵語與普通話同屬漢語，只是在發音及個別用詞不同而已。同時，由於不少澳門市民都觀看香港的電視節目及閱讀香港的報章，不少香港詞彙亦成為澳門日常用語。

時至今日，能流利使用葡萄牙語的人仍然受不少澳門政府部門及商業機構所青睞，皆因大部分澳門的舊法律仍然是以葡萄牙文為本，現時仍有不少法律條文未有中文翻譯，這情況令澳門對外貿易受到一定程度上的影響。葡國文化在回歸前後仍然受到政府的尊重及推廣，是極為難能可貴的美事。



《商法典》

現在只有《商法典》（Codigo Comercial）是有英文翻譯，但譯者Jorge A. F. Godinho強調這只是「英文非官方版本。只有中文及葡本文才是官方的」（English unofficial translation. Only the Chinese and Portuguese versions are official）。²³

註釋

1. 戴裔煊：《〈明史·佛郎機傳〉箋正》，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
2. 吳志良、金國平，「從葡、西早期檔案資料探究「澳門」各種書寫形式的嬗變」，〈澳門研究〉，第五十二期，頁1-5。
3. 鄧景濱：「澳門外文稱謂Macao非借用於緬甸」，〈澳門研究〉，第13期，1999年。
4. 因此澳門也被稱為「一個海風吹來的城市」或「颱風之鄉」，詳見嚴忠明：《一個海風吹來的城市：早期澳門城市發展史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及賈淵、陸凌梭著；[陳潔瑩譯]：《颱風之鄉：澳門土生族群動態》(*Em Terra de Tufões: Dinâmicas da Etnicidade Macaense*)，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5。
5. 何偉傑：“Beyond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aipa, Coloane, and City Development” (〈世界文化遺產以外：路氹地區的轉型與城市發展〉)，*Chinese Cross Currents*, Vol. 5.4, 2008, pp. 102-107.
6. 此數字據「中國新聞網」3月1日最新公報的澳門統計局2010年12月31日人口數據。詳見「截至去年12月31日澳門人口估計為55.23萬人」<http://big5.chinanews.com:89/ga/2011/03-01/2874818.shtml>
有關澳門的人口研究，詳見趙利峰、鄭爽：〈明清時期澳門人口問題札記三則〉，〈華南師範大學學報〉，2009年6期，頁144-150。
7. 劉月蓮及黃曉峰：〈澳門：從歷史失語症看跨世紀文化整合〉，吳志良主編；中文編輯程祥徽，孫成敖；英文編輯楊秀玲：《東西方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澳門：澳門基金會，1994，頁84-95。
8. 吳志良：《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澳門：澳門成人教育學會，1998。
9. 劉羨冰：《澳門教育史》，澳門：澳門出版協會，2007年。
10. 《趙書澤堂家譜》，澳門：鄴仲漳抄錄，1858年。
11. 陳樹榮、王寧光：《澳門傳統中式建築》，澳門：晨輝出版有限公司，2002。
12. 楊仁飛：「澳門社團發展——過去、現狀與展望」，載《澳門研究》，1998年第3期。
13. 伯來拉、克路士等著；何高濟譯；Charles Ralph Boxer 編注：《南明行紀：近代歐洲人眼中的中國南方》，台北市：台灣書房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頁4。
14. 吳志良，〈葡人內部自治時期的澳門〉，載《澳門研究》，1998年，第7期，頁58-82。

15. 香港藝術館、香港市政局主辦：《錢納利及其流派》，香港：市政局，1985年。
16. 楊仁飛：〈澳門社團發展——過去、現狀與展望〉，載《澳門研究》，1998年，第3期。
17. 楊仁飛：〈澳門社團發展——過去、現狀與展望〉，載《澳門研究》，1998年，第3期。
18. 鏡湖醫院慈善會編：《鏡湖醫院慈善會創辦一百三十周年紀念特刊：2001》，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2001年及陳樹榮主編：《同善堂一百周年特刊，1892–1992》，澳門：同善堂值理會，1992年。
19. 傅玉蘭主編；陳麗蓮編輯：《抗戰時期的澳門》，澳門：文化局澳門博物館，2002年。
20. 有關土生葡人的口述歷史，詳見趙燕芳：《葡人土生訪談》，澳門：澳門國際研究所出版，2004年。
21. 李觀鼎，〈論澳門土生文學研究〉，載《澳門研究》，2002年12月。
22. Instituto Juridico de Macau, *Carlos D'Assumpcao: O Homem, o Jurista e o Politico* (《宋玉生：公民，法學家和政治家》)，Macau: Instituto Juridico de Macau, 1996.
23. Jorge A. F. Godinho 翻譯 Cheang Han Iu 校對, *Commercial Code*, Macau: Legal Affairs of the Macao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2003.